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美麗的力量：從日治時期高雄地區婦人組織探討婦女社交場域之生成與統合

撰文／國立臺灣圖書館編審 蔡蕙頻

摘要

本文以「高雄婦人會館」為引，透過探討高雄地區婦人團體的組織與運作，來探究在地婦女社交場域之生成與統合。

隨著「臺灣婦人慈善會」、「篤志看護婦人會」及「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以及「高雄婦人會」等婦人團體的成立，一步步創出地方上婦女的社交場域，而主事者積極與否，也是牽繫團體發展是否活躍的關鍵因素。然而，它們也因成員高度重疊而不得不面臨整合的問題。從「高雄婦人會館」到「高雄愛國婦人會館」的易名，其實正見證了地方上婦人社交空間由創出、發展到統合的歷程。

關鍵詞：婦人團體、高雄婦人會館、富島巴子

本文曾獲 2018「第二屆寫高雄——屬於你我的高雄歷史」出版及文史調查獎助計畫。

投稿日期：2021 年 4 月 26 日

接受日期：2021 年 6 月 10 日



The Power of Beauty: 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Women's Social Spaces in Kaohsiung Area During Japanese Ruled Period

Hui-Pin Tsai

Editorial Reviewer, National Taiwan Library

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the House of Takao Women's Association(高雄婦人會館), this study aims to probe the organizations and the operations of the women's groups in Kaohsiung area in order to consider the formation and integration of local women's social spaces.

With the formation of women's groups, such as Taiwan Women's Charity Association (臺灣婦人慈善會), Association of women volunteer nurses (篤志看護婦人會), Patriotic Women's Association Taiwan Branch (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 and Takao Women's Association (高雄婦人會), the local women's social spaces were created step by step. Besides, the crucial factor to the growth of groups was the principles' proactiveness. However, due to the overlapping memberships, these groups have no choice but to face the situation of integration. With the name change from the House of Takao Women's Association to the House of Takao Patriotic Women's Association (高雄愛國婦人會館), the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integration of local women's social spaces were witnessed.

Keywords: Women's Groups, the House of Takao Women's Association, Tomoko Tomishima

- 壹、前言
- 貳、日治時期高雄地區領導階層之發展及其特色
- 參、日、臺人婦人團體的生成與活動
- 肆、婦人社交場域的統合
- 伍、結論

壹、前言

大正 10 年（1921）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後藤新平夫婦倡議，為增進高雄州所屬各地婦人間的親密和睦，正式成立愛國婦人會館高雄州支部，簡稱為高雄婦人會，並在富島巴子等幹部的努力下開始興建。

大正 12 年（1923）內部設備完工，於同年公佈實施「愛國婦人會館管理規則」，接受各機關租用。昭和 13 年（1938）其改建工程完工，樓上全部改建為沐浴場所及寢室，樓下則改為食堂、撞球場。民國 34 年（1945）又改為中華民國紅十字會高雄分會附設紅十字育幼中心。¹

這是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網站上有關高雄愛國婦人會館的介紹。這段有關高雄愛國婦人會館的歷史沿革提到兩項重點：第一，「愛國婦人會館高雄州支部」，簡稱為「高雄婦人會」；第二，該會館是在富島巴子等幹部的努力下開始興建的，1923 年內部設備完工。

然而，根據《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沿革誌》所載，1920 年地方制度改正之後，愛國婦人會為呼應此項政治變革，在各州設置州部，各郡則設置幹事部，因此該會高雄州支部由高雄州知事富島元治的妻子富島巴子出任。不過，《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沿革誌》也提到，富島巴子「不以此而感到滿足，而另外發起高雄婦人會」，在市郡設置支部，同時，該會也動工興建高雄婦人會館。直到 1923 年，高雄婦人會方解散，並將高雄婦人會館轉贈予愛國婦人會高雄州支部。²

1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網頁「原愛國婦人會館（紅十字育幼中心）」古蹟歷史沿革介紹。資料檢索日期：2018 年 9 月 16 日。網址：<http://heritage.khcc.gov.tw/Heritage.aspx?KeyID=49001c0e-2ea3-4162-b8ca-0edcc855c70e>。惟時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及其夫人和子所倡議成立者為「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而高雄州支部之成立為 1920 年，此時後藤新平已非總務長官（原民政長官）。

2 大橋捨三郎，《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沿革誌》（臺北：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1941），頁 697-698。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貳拾五周年》（臺北：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1929），頁 53。

也就是說，對照史料，網站上的說明不完全正確。首先，「愛國婦人會館高雄州支部」和「高雄婦人會」應是兩個各自獨立、無隸屬關係的團體，後者並非是前者的簡稱。第二，高雄婦人會館不是由愛國婦人會高雄州支部所建設，主事者是高雄婦人會。

現今吾人對於歷史古蹟的認識，和史料上的記述有所出入，這不單純只是史料解讀錯誤的問題，暗藏在其背後更大、更重要的意義是，我們可能因為對於過去的歷史掌握甚少，有時甚至可能產生張冠李戴、以偏概全的錯誤。

具體來說，在爬梳史料、引經據典之後，即使修正了高雄愛國婦人會館的歷史沿革，其實也僅是做到了歷史除錯的基本功夫而已。更令人好奇的是，高雄婦人會是什麼樣的組織？它和愛國婦人會高雄州支部的關係如何？為什麼高雄婦人會要興建婦人會館？又為什麼要將婦人會館捐贈予愛國婦人會高雄州支部？要之，透過爬梳地方上婦人團體的運作，我們還能夠窺知地方上臺、日人婦女社交場域的生成與整合。

洪郁如曾以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為研究對象，探究其於 1904 年至 1930 年間的活動情形，指出該會的功能。在婦人聯誼方面，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集結了臺、日人統治階層的女眷，宛如女性版的統治結構，也牽涉到統治當局與臺灣人仕紳之間政治與經濟的意圖。³

日治時期臺灣人和在臺日人在這片土地上共生，綜觀日治時期臺灣的領導階層，隨著在臺日人的流動漸趨穩定，在臺日人地方社會與人際網絡逐漸成形，領導階層的婦人社交也隱約可見其輪廓，由於男性的日人領導者在統治上，相當程度需要得到臺灣人領導階層的協力，因此日人婦女某種程度上來說，也扮演這樣的功能，社會對家庭內理想女性的期待，除了是優秀的家政管理者之外，還須是「輔佐丈夫的外交家」，透過加入殖民地婦女組織來維繫或拓展家族的利益，或是為子女謀得更廣泛的教育資源，讓他們能進入日本人為主的學校就讀。⁴

換句話說，日治時期臺灣經營「夫人外交」的太太小姐們，並不是完全被動地接受官方組織或男性的動員，她們一方面是官方用以作為政治宣示的樣板與工具，另一方面，她們本身也具有能動性，透過社交活動擴大家庭的影響力，並營造自身作為賢妻良母的

3 洪郁如，〈日本殖民統治與婦人團體——試論 1904-1930 年的愛國婦人會台灣支部〉，《臺灣風物》，47（2）（1997），頁 53-71。

4 洪郁如著，吳佩珍、吳亦昕譯，《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臺北：臺大出版中心，2017），頁 393-401。

溫婉形象。

然而，過去有關日治時期的婦女團體及其活動，缺少地方性的視野，對於地方性婦女團體與全臺性婦女團體的互動與整合，更是缺乏。因此，本文更深一層的研究意義是：透過梳理日治時期高雄地區之婦人組織的發展情形，來探究她們如何透過這樣的婦人組織，來建構女性的社交場域，進而，再勾勒出地方婦女社交場域的形成與演變後，伴隨著國民統合的政治進程，這些地方上的婦人組織，由地方組織逐漸被收攏於國家動員架構之中，成為臺灣女性動員下的一環。

在研究的概念上，依照本研究的設定，在概念上可以分為「全臺性」（Taiwan size）與「地方性」（local）兩種層級，而「地方性」（local）帶有「次級」（subordination）的意涵。

從歷史發展的條件上來看，臺灣是一個地理條件特殊的海島，社會結構的發展亦深受地理條件的影響。中央多山導致河流多呈東西向，地區與地區之間的聯外交通只能仰賴橋梁建設。地理特性連帶也影響了社會發展，清治時期，臺灣雖然逐漸由移民社會（immigrant society）走向土著社會（native society），⁵無論是人或地，均呈現越來越緻密化、地方化的現象，但因河川阻絕了河川南北陸地的連結，再加上交通條件長期較不發達，不僅地域社會結構穩固，各項發展也可見到強烈的地域社會之性格。本研究所使用的「地方性」一詞係指臺灣內部的任一微小、有機單元，它是組成「全臺性」的基本元素，具有足堪脫離其他地區、獨立發展的特色。在空間上類似「地域社會」概念，即社會學所謂的「社區」（community），在人群分類上，「地方性」則表現為「群體」（group），本文中採用「一群住在同一地區的人，具有較長期的居住時間，和較高的社區意識，也即是從屬感」之定義。⁶

而「全臺性」的概念則是以「臺灣全體」為基礎，在空間上，相對於日本本國或其他臺灣以外地區，是臺灣內部跨地域的全面連結，在人群上則以全臺住民為主，無論是臺灣人或在臺日人，都是跨越臺灣各地域的統合指涉，類似若林正文研究中所提出的「臺

5 陳其南，〈臺灣的本土意識與民族國家主義之歷史研究〉，收於陳其南，〈傳統制度與社會意識的結構——歷史與人類學的探索〉（臺北：允晨文化，1998），頁172。

6 文崇一，〈臺灣的社區權力結構〉（臺北：東大圖書，1989），頁iv。

灣層級（臺灣レベル）、臺灣大」一詞。⁷

這樣的地域分層概念也被廣泛地運用到臺灣史的各個面向，特別是政治史研究。有關日治時期臺灣政治史的研究，不僅聚焦在臺灣人與官方的對抗關係，也多將「全臺性」與「地方性」切開探討，例如關於非武裝的政治活動，「全臺性」以 1910、20 年代以來臺灣人的政治運動為主，「地方性」則偏向於小地區的政治權力結構的繼承與變化，然而這兩種規模的政治活動是同時並存的，應該有更能兼納兩者的觀點。

因此，本研究也借用這樣的觀點，將婦女團體的規模與活動範圍概可分為「中央型」與「地方型」兩種層次。本文主張，婦女團體可分為以全臺灣為規模的「全臺型」婦女團體，在臺灣南部或高雄地區設有支部，作為整個團體中的一環；同時，地方上也有「地方型」婦女團體，以單一的地方行政區域為活動範圍，組織幹部與會員皆以地方人物為主。「全臺型」婦女團體及「地方型」婦女團體彼此或有重疊但互不衝突，共同推動各種規模不一的活動。

除了地方人士組成的婦女團體之外，1920 年代臺灣社會因有志青年有計畫、有意識地推動社會改革，而躍升出另一種婦女運動。1920 年代，受到世界思潮的影響，留學日本的新式青年結合部分在地仕紳，臺灣內部興起追求政治待遇之改善及推動社會改革的社會運動，其中，他們亦訴求女性地位的提升，鼓吹女性的自我覺醒，積極動員女性參與政治社會運動，且其中亦不乏女性自身推動的婦女運動組織，如彰化婦女共勵會、諸羅婦女協進會等等。⁸ 不過，雖然同屬民間團體，但新式青年們所推動的社會改革路線中的婦女運動或團體，非與愛國婦人會等團體屬於同樣的脈絡，不能同一而論，因此，本文有必要先說明「婦人組織」的定義。

本文所謂的「婦人組織」，指的是以婦女為主要成員的團體，縱使有少數男性參與，或對該團體具有影響力，婦女仍是該團體的主要成員，主要活動亦以團體中的女性來擔綱。本研究所稱之高雄地區婦人組織，係指 1895 年日治以後在高雄地區活動、非屬政治改革路線的婦女親睦團體，具體而言，即為愛國婦人會高雄州支部為主軸的婦人組織。愛國婦人會是日治時期臺灣社會規模最大、活動時間最長的婦人組織，以成員集結了當

7 若林正文，〈內地延長主義と「台湾議會」〉，收於若林正文，《台灣抗日運動史研究 增補版》（東京：研文出版，2001），頁 59-61。

8 楊翠，《日據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以〈台灣民報〉為分析場域》（臺北：時報文化，1993）。

時具有聲勢名望的臺、日人女性為人所熟知，在各州設有支部。不過，本文不僅是討論愛國婦人會高雄州支部，亦溯及在其以前的地方婦人組織，探討婦人團體由地方而中央的統合過程。

洪郁如在其大作《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中以愛國婦人會為例，闡釋臺、日人女性參與婦女團體的動機。她指出，臺灣人婦女加入愛國婦人會，對於該會的資金收取與會員募集有很大的助益，且當局為了掌握協力階層，對於日本人女性與臺灣人名望家族的女性成員的交流也持肯定的態度。另一方面，臺灣人女性亦為了保持家族在地方的權利基礎以利事業通暢，與當地的日本人官員之間保持圓滑的關係是不可或缺的要素。⁹

基於這樣的觀點，要了解高雄地區婦女團體的組成，必得先勾勒當地領導階層的面貌，因此，本文先說明高雄地區領導階層的生成，再述婦女團體的組成與活動情形，並藉由成員的分析，來說明女性社交場域的生成；最後，再透過地方型婦女團體與全臺型婦女團體的互動，來說明女性社交場域的整合。

最後是有關於本文關注「高雄地區」之名稱與幅員。1920年臺灣地方制度改正之後所成立的高雄州，範圍包含今日的高雄市及屏東縣，幅員遼闊；在行政層級上，州下又有市、街、庄等地方行政區劃，層層堆疊。為聚焦討論的空間範圍，本文所指涉之「高雄地區」，主要係以日治時期的高雄市為中心，必要時述及大高雄地區其他區域。在「高雄」地名的稱呼上，由於1920年以前「高雄」尚名為「打狗」，為合於歷史發展，行文之中，所指涉之時序若為1920年以前，即稱「打狗」；若為1920年以後之發展，則稱「高雄」。

貳、日治時期高雄地區領導階層之發展及其特色

由於臺灣史的發展最初以臺南為據點，因此，鄰近臺南的大高雄地區發展亦早，清治初期即有鳳山縣的設置。然而高雄一躍成為臺灣南部的新興都市，則與漁業的發展，以及1858年以後臺灣開港帶來的貿易活動關係最為密切。

9 洪郁如著，吳佩珍、吳亦昕譯，《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頁326。



舊稱「打狗」的高雄，在日治時期以前僅是臺灣西南部的蕞爾小漁村，1858 年〈天津條約〉明定臺灣開港，1860 年正式開港後，領事館、洋行等外國勢力進駐，結合臺灣內部的糖業出口，帶動本地的商業發展，少數臺人因善於審時度勢，透過經商貿易來獲取財富，躋身領導階層，如陳中和家族，其影響力延續至日治以後。¹⁰

1895 年以後，日人移居打狗一帶，帶動新一波的發展。王御風指出，打狗商人包含臺人與日人，臺商多集中在旗後、苓雅寮；日本人則可細分為民間商人、大公司（如臺銀、三井物產）的打狗分部，前者以旗後為據點，後者則多將分部設於哨船頭，至於鹽埕，則幾乎都是為了興築縱貫鐵路而來。¹¹

1908 年至 1913 年間，因縱貫鐵路通車，以及打狗港的整建，使該地建築、土地開發、運輸等產業蓬勃發展，王御風稱之為「打狗產業的萌芽時期」。1914 年至 1920 年間，鐵路、築港等基礎建設已陸續完工，為打狗打造良好的交通條件，淺野水泥、臺灣鐵工所等工廠紛紛落腳於此，帶動日本居民的大量移入，打狗從一個生產蔗糖、經營漁業的沿海聚落，轉而成為以工業、金融業為主的新興都市，王御風稱此時期的特色為「打狗工業的初期發展」。¹²

有關高雄地區的領導階層，王御風以高雄市級議會為主軸，透過討論 1920 年以來高雄（街）市議會議員來勾勒高雄領導階層的面貌。而 1920 年以前，由於高雄街尚未設置，因此打狗地區領導階層以臺、日商為主。日商部分，又可分為「外來日商」和「在地日商」，「外來日商」的主要資金來源為大型財閥，高雄地區的經營僅為其事業版圖的一部分，代表人物有創立臺灣製糖、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及臺灣商工銀行的荒井泰治、經營大日本製冰會社高雄工場，與荒井泰治往來密切的古賀三千人、鹽水港製糖株式會社社長楨哲，以及淺野水泥株式會社負責人淺野總一郎、有「金山王」、「煉瓦王」等稱號的鯨島煉瓦株式會社經營者後宮信太郎等人；「在地日商」的事業與資金則集中於高雄地區，知名的在地日商有大坪與一集團（大坪與一、荒木萬三郎、高木拾郎、真砂由次郎、小川與市、吉井長平）、經營臺灣運輸株式會社的杉本音吉、專注經營化學工業的多木龍二等人。¹³

10 王御風，〈高雄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1920-1960）〉（臺北：玉山社，2013），頁 28-29。

11 王御風，〈高雄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1920-1960）〉，頁 29。

12 王御風，〈高雄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1920-1960）〉，頁 30-42。

13 王御風，〈高雄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1920-1960）〉，頁 44-61。

至於臺商，則有苓雅蔡陳福謙家族、經營新興製糖株式會社的陳中和家族、創立打狗製酒株式會社（後改組為南部製酒株式會社）的陳光燦家族，以及旗後地區大型商行「新泰記」經營者葉宗祺家族。¹⁴高雄地區的富商巨賈，在1920年實施「臺灣地方制度改正」，設置高雄州、高雄街以後，獲選成為州協議會員或街協議會員。

相對於王御風集中於觀察市（街）協議會員，高雄地區的領導階層也應該包含政治人物在內才是，所謂政治人物，具體而言就是1920年以前的廳長、支廳長，以及1920年以後的州知事及郡守，依照行政層級不同，在市街庄的層級，市尹、街庄長也能視為領導階層，只是影響力較小。

我們經常看到1920年以前，多種官方主導成立的組織，或是與官方往來關係密切的地方團體，會長、副會長等要職經常由該地廳長、支廳長等地方官出任，而次級首長則出任團體的核心幹部，他們不只是掛名的虛職，通常也掌握一定的權力，對組織的運作方針與活動走向產生相當程度的影響。然而，由於日治初期臺灣地方制度尚未穩定，地域倏忽改隸，人事異動頻繁，直到1901年實施廳制以後才稍微穩定，此時也是高雄地區產業發展突飛猛進的時刻，住民的流動也逐漸穩定。1920年因「臺灣地方制度改正」而實施州廳制之後，高雄婦人會與愛國婦人會高雄州支部隨即成立，其會長、幹部等要職亦與州知事等地方官吏的夫人為主，因此，在剖析高雄地區婦人團體的組成與運作之前，有必要先了解這些地方官員是哪些人。

1920年誕生的高雄州，所轄範圍在1901年至1909年間分屬於鳳山廳（下轄打狗支廳、楠梓坑支廳、阿公店支廳）、蕃薯寮廳（下轄山杉林支廳，1906年調整、改名為阿里關支廳）、阿猴廳（下轄阿里港支廳、內埔支廳、萬丹支廳、東港支廳、潮州庄支廳、枋寮支廳，萬丹支廳於1903年廢止，內埔支廳於1905年廢止）與恆春廳（下轄枋山支廳、蚊蟀支廳）；隨著1909年地方行政區調整，高雄地區又分屬臺南廳轄下的鳳山支廳、打狗支廳、阿公店支廳、楠梓坑支廳，以及阿猴廳轄下的阿里港支廳、甲仙埔支廳、六龜里支廳、蕃薯寮支廳、潮州支廳、東港支廳、枋寮支廳、枋山支廳、恆春支廳與蚊蟀支廳（蚊蟀支廳於1913年廢止），另還有澎湖廳所轄之小池角支廳、大赤崁支廳及網垵支廳（大赤崁支廳於1913年廢止，小池角支廳則於1915年廢止）。本文將高雄地區在

14 王御風，〈高雄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1920-1960）〉，頁62-76。



1901 年至 1909 年間「二十廳時期」各廳長、支廳長名單整理為文末「附表 1：二十廳制時期（1901-1909）高雄地區行政首長列表」，1909 年至 1920 年州廳制實施前的「十二廳時期」各廳長、支廳長整理如文末「附表 2：十二廳制時期（1909-1920）高雄地區行政首長列表」。至於 1920 年州廳制實施至 1923 年高雄婦人會解散為止，高雄州知事至街庄長等各級行政首長抄列如文末「附表 3：州制初期（1920-1923）高雄州知事及（郡）街庄長列表」。

透過附表 1 至 3 的整理，我們可以發現幾個現象。首先，行政官僚全數為日本人，沒有臺灣人參與的空間，這表示他們的女眷（如母親、妻子）領銜的地方婦女團體也將由日本人主導。

其次，高雄地區行政官僚的異動相當頻繁。廳長人選雖有異動，相對來說較為穩定，儘管也有任期較短者（如桑原外助於阿緱廳長的任期僅一年），但大致上都在五年以上；相對於此，支廳長的更迭則較為活躍，即使也有任期達五年以上者，但更常見到的是任期僅一至三年者，觀察支廳長的名單與任期，甚至到職一年即異動者也屢見不鮮，特別是 1901 年廳制甫實施之初，幾乎年年有人事調動。整體而言，行政官僚呈現出「越基層，人事異動越頻繁」的現象。

第三，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細緻地來看，儘管支廳首長調動不止，但可明顯看到人員常在高雄地區各支廳輪調，例如潮州庄支廳長般若三郎在 1903 年調動至阿公店支廳，枋寮支廳長中島友五郎在同年調往阿里港支廳，兩年後的 1905 年又調往潮州庄支廳；內埔支廳長山內定一在 1904 年異動為潮州庄支廳長；山杉林支廳長園部龍因在 1905 年調派至阿公店支廳。此外，萬丹支廳長上井其介在該支廳廢止後，調往阿里港支廳，內埔支廳長入佐宗計佐同樣在 1905 年廢止該支廳後被調往潮州庄支廳。而枋寮支廳長大澤嘉十郎在 1906 年調往潮州庄支廳，蚊蟀支廳長早川半之資也於 1909 年調任枋山支廳長。

進入 1909 年至 1920 年的十二廳制時期之後，二十廳制時期曾任高雄地區各支廳長的就有 8 人繼續留在高雄地區服務。同樣地，在十二廳制時期，支廳長在各支廳之間輪調的現象也顯而易見，曾經同時兼任多個支廳長或是前後擔任一個支廳以上的支廳長就有 16 人。

也就是說，至少在高雄境內，人事異動雖然看似頻繁，但其實行政官僚所羅織起的人際網絡流動率有限，連帶著主導高雄在地婦女團體的在地行政官僚女性眷屬也只是換

湯不換藥，頭銜異動而人不變，因此男性行政官僚的人事異動，對高雄地區婦女團體成員的影響或許不如想像中巨大。

以上屬於行政官員的分析。然而我們也明白，如果沒有地方領導人物的協助，光靠行政官僚的力量，要推動行政事務實有難度，因此，要論領導階層，民間領導階層同樣重要，那麼，除了王御風所指出的紳商之外，領導階層還可能是哪些人呢？

早在日治之初，殖民政府就賦予地方士紳基層公職，一方面將他們納入行政體系之中，利用其名望或財力來推動基層行政事務，一方面也藉以節約行政成本。到了 1901 年廳制實施之後，〈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官制〉規定「廳得置參事。各廳參事以五人為限，給判任官待遇。參事為居住於廳管轄範圍內，具學識名望者由廳長任命之。」¹⁵至 1909 年以後新設的「區長」人選，官方雖僅言及其職務在於「接受廳長指揮、監督，輔助部內行政事務之執行」，¹⁶未規範人選須具學識資望，但官方仍有選任地方上的富家大族或知識份子為區長的偏好。因此我們可以說，各廳下的參事、區長，至少是官方認可的地方領導人物，而他們也是政府在推動地方行政事務時，主要動員的對象。本文將 1901 年至 1920 年間高雄地區各區長列如文末「附表 4：十二廳制時期（1909-1920）高雄地區參事及區長列表」。1920 年以後，〈臺灣州制〉讓各州組織協議會以為知事諮詢政務，而由臺灣總督任命的州協議會員需為「居住於州內，具學識名望者」，¹⁷故州協議會員也可視為地方領導人物。本文將 1920 年至 1923 年高雄州協議會員名單列如文末「附表 5：州廳制初期（1920-1923）高雄州協議會員列表」。

透過名單的整理，我們注意到基層公職人員同樣具有幾項特色，第一，基層公職幾乎為臺灣人的天下。廳治時期，各區區長全數為臺灣人，沒有日本人。1920 年以後，由於郡守由警察人員出任，因此郡守層級由日本人所獨佔，而郡之下的街庄長則以臺灣人佔絕大多數，唯有少數街庄長由日本人擔任，如：馬公街長上瀧宇太郎（1920-1923）、高雄街長鐸木直之助（1920-1922）、加福均三（1922-1923）、高橋傳吉（1923）、岡山

15 「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官制改正」（1901 年 11 月 19 日），〈明治 34 年 11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1059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頁 51。

16 「臺灣街庄社二區長及區書記ヲ置クノ件」（1909 年 9 月 24 日），〈明治 42 年 9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2798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頁 45。

17 「臺灣市制」（1920 年 7 月 30 日），〈大正 9 年 7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2170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頁 56。

庄長齋藤善次郎（1921-1923）、阿蓮庄長高橋善松（1923）、鳳山街長青木惠範（1920-1923）、齋藤永治（1923），以及小港庄長大槻林藏（1923）。州協議會員的組成，則是由臺、日人共同組成，成員的背景也包含官員與民間人士。

第二，區長通常出身地方上的紳商家族，如：打狗區由葉宗棋長期擔任，苓雅寮區長則是陳福謙的二子陳文遠擔任，繼文遠之後擔任區長的陳晉臣雖非陳福謙家族成員，但其曾為陳家事業順和棧的重要幹部，與陳家關係相當密切。阿里港區長藍高全出身里港藍家；蕃薯寮區長陳順和資產達一萬圓，¹⁸ 內埔區長鍾晉郎二長期在地方上綜理堤防修建的公共事務，資產亦有一萬二千圓；¹⁹ 車城區長許連升資產一萬圓，²⁰ 等等。此外，由於各年度《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所登載的區長姓名略有出入，有些區長姓名雖然不同，但實屬筆誤，初步可判斷為同一人，有些則需進一步比對資料才能確定，此種情況，本文於列表中一律列出，並註明「可能為同一人」，留待未來進一步釐清。

第三，區長的流動率很低。相對於行政官僚的異動，由臺灣人擔綱的區長新陳代謝更加緩慢，好幾個區是長期由同一人或同一家族的成員擔任區長，往往父死子繼，或是由家族其他成員出任。我們若將時間軸再往前、往後一些來觀察，他們之中在更早的時候即擔任地方參事等職，協助地方事務的人不在少數，1920 年之後，不少曾在廳治時期擔任區長的人物，此時繼續被延攬擔任街庄長。易言之，儘管地方制度或行政區範圍或有不同，但行政制度的改變造成領導人物流動的現象並不明顯，他們所描繪的，正是地方領導階層的面貌。

綜上所述，高雄地區領導階層可說是由官員與民間領導人物共同組成，官員或有異動，但越接近 1920 年越為穩定；民間領導人物更是不因行政制度調整而更迭，其影響力跨越各個時期。官、民之間各自扮演政策推動的領頭羊，以及政策執行的協力者角色，他們的女眷通常也複製這樣的模式，成為由日本人主導、臺灣人協助的互動關係。

18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1916），頁 330。

19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338。

20 鷹取田一郎，《臺灣列紳傳》，頁 334。

參、日、臺人婦人團體的生成與活動

本島之婦人女子。多伏處深閨。跬步不出戶庭。即有親戚至。苟非不得不見者。亦匿而不出。反是。即以為背於禮法。而交口譏之。其所以如此之嚴者。意在防微杜漸。養成廉恥。洵不得厚非之也。²¹

1906 年，《臺灣日日新報》上出現這則有關臺灣婦女的報導。報導指出，臺灣婦女受教甚嚴，素來以不出深閨為傳統，目的在於「養成廉恥」。言下之意，越是深入簡出，不問世事，越具遵循禮法的女德，因此「本島之婦女。在中上等會社（按：應為「社會」）。鮮有讀書識字者。惟謹守深閨。日課女紅。並不與聞家事。與日本婦人大相逕庭。」²²清代臺灣缺乏大規模、有系統的女子教育，儘管少數富貴之家願意聘請教師為女眷授課，內容也非如男性以科舉任官為教育目的，而是著重才藝的養成，以提升未來談論婚配時的己身條件。在這樣的觀念下，臺灣婦人自難有所謂社交活動，更遑論是以女性為主的社交場域。

然而，進入日治時期以後，隨著官民的鼓勵、女子受教育等因素之影響，女性不再以藏身深閨為德行的準則，再加上日本人來到臺灣之後，凡是出身地方上略有影響力的家族，都成為日本政府拉攏示好的對象，家中男性有與日本人交際往來。

婦女觀念逐漸改變，社會上逐漸可見臺人婦女參與社交場合的身影。例如 1909 年始政紀念日，66 位出席紀念活動的臺人男性賓客中，攜帶夫人出席者高達 55 名，時謂「以上之數。視諸例年。則本年本島婦人之受招待者。尤為多數也云。」²³

綜觀日治時期，臺、日人之間另一種較常見的社交活動則為「名刺交換會」。「名刺」即名片，每年新年期間，各地官民多在每年 1 月擇日舉行「名刺交換會」，通常採事先報名制，開放地方上官民代表人物申請參加，透過交換名片來聯誼，彼此祝賀新年。惟此類活動多由男性參加，女性難以參列其中。

對此，女性亦曾效仿男性，舉辦女性專屬的「名刺交換會」或「交禮會」，例如

21 〈女教勃興〉，《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06 年 5 月 27 日），第 2 版。

22 南樵，〈臺灣婦女生活界〉，《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08 年 1 月 1 日），第 9 版。

23 〈夜會待賓〉，《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09 年 6 月 17 日），第 4 版。



1917 年桃園舉辦「新年婦人交禮會」，以敦親睦，共有日人婦女 85 名、臺人婦女 102 名與會；²⁴ 與此同時，臺中地區的愛國婦人會、篤志看護婦人會及臺中婦人會等三婦人會員也舉辦名片交換聯誼活動；²⁵ 1924 年基隆、中壢等地舉辦「婦人名刺交換會」，²⁶ 1931 年桃園亦舉辦同樣活動。²⁷ 這類婦人社交活動在 1920 年代以後蔚為風行，多由地方婦人會主辦，活動之中，地方首長參列致詞，並由官界首腦的夫人主持，流程與男性社交活動幾乎如出一轍。換句話說，婦人會仍是地方上婦人交誼的團體，而這些活動是婦人會的衍生活動之一。

日治時期臺灣的婦人團體可概分為「全臺型」與「地方型」兩大類，「全臺型」婦人團體係以全臺各地婦人為會員招募對象，其組織以「臺灣」為名，並在各地設有支部；「地方型」婦人團體則以地方（1920 年後，多為「州」級組織）為名，會員亦以地方人士為主，若設有支部，通常以街庄為單位。以下將就此二類婦人團體的特徵及其在高雄地區的活動情形進行說明。

一、全臺型婦人團體：篤志看護婦人會、臺灣婦人慈善會與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

日治前期，三大全臺型婦人團體分別為「篤志看護婦人會」、「臺灣婦人慈善會」（以下簡稱「婦人慈善會」及「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以下簡稱「愛婦臺灣支部」）。簡要整理其發展梗概如下。

（一）篤志看護婦人會

這三大團體中，最先成立的是篤志看護婦人會。1859 年，瑞士人亨利·杜南（Henry Dunant）眼見義大利統一戰爭時，地方婦女對於傷患救治的貢獻，於是振臂高呼籌組國際性救護組織的必要。在他的努力之下，1864 年，比利時、丹麥、法國等 12 個國家簽

24 〈桃園婦人交禮會〉，《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7 年 1 月 9 日），第 6 版。

25 〈臺中地方近事〉，《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7 年 1 月 10 日），第 3 版。

26 〈基隆特訊〉，《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4 年 1 月 13 日），第 6 版。

27 〈桃園婦人會的名刺交換會〉，《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1 年 1 月 17 日），第 7 版。〈中壢近信〉，《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4 年 1 月 4 日），第 2 版。

署人道公約《日內瓦公約》，各國約定在戰時，不論國籍，傷病者皆應受到醫療照護。²⁸

在此三年後的 1867 年，第一屆紅十字國際會議在巴黎召開，同時舉行的巴黎萬國博覽會中亦設置紅十字展覽館，佐賀藩代表佐野常民也參加了這次盛會，佐野深深認同這種無差別人道救援的理念。當他返回日本，國內正是戊辰戰爭戰況最激烈之時，透過外國籍醫師，紅十字會的理念得以傳入日本，並在這次的戰爭中實踐。1873 年，佐野以維也納萬國博覽會事務副總裁的身分再度赴歐，這次的歐洲行，讓他更加了解紅十字會的擴張與運作，他認為，此種人道組織的擴張，正是文明進步的象徵。²⁹

1877 年，時任元老院議官的佐野，向右大臣岩倉具視提出慈善團體「博愛社」的申請，該團體同樣以推動戰時無差別的人道救援為成立宗旨，可說是和紅十字會如出一轍。然而可惜的是，佐野此次申請卻遭到駁回，他再接再厲地向正在西南戰爭中肩負征討總督要職的有栖川宮熾仁親王提出申請，擁有戰爭經驗、體驗過戰場殺戮的有栖川宮認可了佐野的申請，博愛社終於成立了。該團體隨即派遣醫護人員前往軍團醫院協助戰場傷患的救治，他們的援護行動，直到西南戰爭結束後仍持續進行。該會經過太政官的正式認可，由東伏見宮嘉彰親王擔任總長，佐野常民則被選為副總長。³⁰

1887 年，博愛社改名為赤十字社，佐野出任首任會長，該社遵照有栖川宮熾仁親王妃董子殿下的旨意，模仿西方紅十字會婦人組織，成立篤志看護婦人會，作為該社的婦人慈善事業，同時，該事業也帶有矯正社會對於看護婦的偏見之目的，而其所推動的看護婦培育，是近代日本重要的護理人才培育來源。³¹

由赤十字社的成立脈絡可知，篤志看護婦人會乃是日本在模仿西方的立場之上，以文明進步的觀點來推動的婦女慈善團體，各地陸續成立支部。臺灣在歸入日本版圖之後，赤十字社同樣基於婦女慈善動員的理念，隨即於 1896 年在臺北設置赤十字社委員部，各縣廳設置支部，而作為赤十字社事業骨幹之一的篤志看護婦人會，則是在 1899 年首先成立於臺北，³²該會在召開臺北支部總會時即「闡明文明之旨趣」，並稱篤志看護婦人會之

28 吉川龍子，〈明治期の赤十字看護教育〉，《明治聖徳記念学会紀要》，復刊第 50 號（2013），頁 388。

29 吉川龍子，〈明治期の赤十字看護教育〉，頁 389。

30 吉川龍子，〈明治期の赤十字看護教育〉，頁 389。

31 吉川龍子，〈明治期の赤十字看護教育〉，頁 389-403。

32 作者不詳，《臺灣形勢概要》第 2 冊（出版項不詳），頁 779-781、783-784。



成立為「利國益民，是由將天地與品德合而為一的婦人所組成之團體。」³³該會招募社會賢達之婦人，施以看護法、育兒法之訓練，「以備有朝一日，有事之時，雖為婦人，能夠貢獻己力。」

此會成立之初，亦有 40 餘位臺灣婦人加入，然而纏足婦人走路踉蹌，行動不便，遇有訓練之時，總是舉步維艱，起居動作皆有困難。³⁴原來，臺灣婦女纏足被視為是參與慈善事業的阻礙，因此黃玉階在篤志看護婦人會上演說時表示，臺人婦女「慨然組成天然足會，欲除弊俗。數年之後，臺島婦人必能同感維新，同享文明，屆時女丈夫必非由日人婦人所獨佔。」³⁵去除纏足之風俗，是臺人婦女參與慈善活動的第一步。

話說回來，究竟是哪些人參與篤志看護婦人會呢？根據臺南地區篤志看護婦人會的介紹，該會自 1905 年創立臺南支部以來，會員多為「上級官吏或有地位名望的實業家之夫人」，³⁶此為臺南地區的情形，其他支部應亦是如此。至於臺灣人婦女加入該會的情形，《臺灣形勢概要》一書說明最初入會的臺灣婦女共有 40 餘名，她們多為「知名紳士豪商的夫人、令媛」，該書亦說明，僅有 40 餘名的原因，乃在於當時「本島的習慣以賢婦淑女生養於深戶之中，不加社交為美俗。」，因此加入者較少。³⁷

1908 年為止，該會已於臺北、基隆、新竹、宜蘭、臺中、臺南等地設有支會，會員不下 228 名。然而「此處所養成之看護婦，悉為貴婦人，假使一朝告變，未知肯馳驅而從事也。」顯然該會有會員非有意為看護婦者，僅將之視為社交組織的傾向，使得該會不得不招募有志成為看護婦者，另委囑臺北衛戍病院權責看護婦之養成工作。³⁸篤志看護婦人會似未設置高雄支部，因此相關慈善活動未見以高雄地區為活動範圍者。

（二）臺灣婦人慈善會

三大臺灣婦女慈善團體中，無論是篤志看護婦人會、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兩者均可視為日本本國婦女團體在臺的分支，組織的架構與運作的模式基本上與本國如出一轍，

33 作者不詳，〈雜報〉，《臺灣醫事雜誌》，2（2）（1900），頁 44-45。

34 金子源治，〈天然足會に就て〉，《臺灣協會會報》，20（1900），頁 25-26。

35 作者不詳，〈雜報〉，頁 44-45。

36 〈雜報〉，《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07 年 1 月 12 日），第 2 版。

37 作者不詳，《臺灣形勢概要》，頁 783-784。

38 〈赤十字社小史〉，《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08 年 10 月 29 日），第 2 版。

唯有臺灣婦人慈善會為臺灣本地創出的婦女慈善團體。

1904 年，正值日俄戰爭之際，為鼓舞軍心，團結官民，臺灣舉辦慈善音樂會以勸募捐款。該音樂會募得款項 15,000 餘圓，扣除活動所需費用 13,000 餘圓，尚餘大額款項。在分別捐款予陸海軍兵部、日本赤十字社特志看護婦人會臺北支會及愛國婦人會等組織後，以剩餘款項 7,000 多圓為基金，成立「臺灣婦人慈善會」，並推舉民政長官後藤新平的夫人為會長。從此之後，該會歷任會長皆由民政長官夫人出任，並隨民政長官更迭。³⁹

為了確保經營之財源，婦人慈善會的事業最初由身兼該會顧問的土木官僚長尾半平規劃，以經營鹽田來作為長久運作的財源。惟其後鹽生產過量導致事業不振，長尾鑑於打狗築港事業的進行，以個人名義買下打狗土地，再轉手給打狗土地整地會社，再得陳中和的協助，1916 年該會資產高達近 21 萬圓之多，成為該會經營之基礎。⁴⁰

婦人慈善會為了從事慈善事業，以推動以下四項為事業項目：（1）慈善音樂會及其他諸會；（2）貧困疾病者、罹災者之救恤與施療，以及免囚保護事業之助成；（3）為了公共衛生而經營溫泉浴場，以及學校等其他教育事業之助成；（4）前述事項之外，為達成本會目的所需之項目。⁴¹作為全臺性婦人慈善團體，該會成立以來，在臺灣各地陸續推動多項慈善事業，其中，在高雄一帶所進行者亦不少，諸如：1906 年夏天，打狗一帶發生嚴重的鼠疫疫情，在該會倡設、總督府聲援及地方政府、財閥會社的財務支援下，⁴²在旗後一帶興建衛生條件良好的住宅，以後藤新「平」與夫人「和」子各取一字，命名為「平和家屋」，收容貧民二百餘戶，解決鼠疫問題；⁴³其照顧的貧戶對象也包含在臺日人；⁴⁴該會亦曾於大湖街（大湖）、阿公店（岡山）、楠仔坑（楠梓）、舊城（左營）、橋仔頭（橋頭）、打狗（高雄）、蕃薯藔（旗山）及鳳山等地舉辦慈善音樂會或電影放映以募款⁴⁵等等，每年的「社會事業紀念日」，該會亦固定致贈金錢或禮品予社福組織。

39 臺灣婦人慈善會，《台灣婦人慈善會誌》（出版項不詳），頁 3-6。

40 臺灣婦人慈善會，《台灣婦人慈善會誌》，頁 16-17。

41 臺灣婦人慈善會，《台灣婦人慈善會誌》，頁 7-8。

42 〈打狗港民家燒拂〉，《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07 年 6 月 27 日），第 2 版。本則史料感謝審查委員的提醒。

43 〈將來之打狗港〉，《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06 年 10 月 7 日），第 4 版。〈打狗細民家屋落成期〉，《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07 年 3 月 9 日），第 2 版。本則史料感謝審查委員的提醒。

44 臺灣婦人慈善會，《台灣婦人慈善會誌》，頁 24。

45 〈鳳山短信〉，《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06 年 12 月 6 日），第 2 版。



除了打狗一帶之外，該會也在其他地區推動多項慈善事業。⁴⁶

經過三十年的經營，該會資產由創立之初的 7,490 餘圓，1934 年時資產已增加至 38 萬餘圓。⁴⁷ 是臺灣規模龐大的婦女慈善團體。

（三）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

與慈善婦人會同年來臺設立的「愛國婦人會」（以下簡稱「愛婦」），則是 1900 年八國聯軍（日稱「北清事變」）之際，為了照顧戰死者遺族，由婦人奧村五百子在 1901 年發起而創立。在臺灣，最初則是在 1904 年設立臺北、臺中、臺南支部，1905 年廢除三支部，改為設立臺灣支部，並於各廳設置幹事，推動全臺性救濟事業，該會首任支部長同為後藤新平夫人後藤和子，其後歷任支部長的也同是民政長官夫人，顧問則為歷任總督夫人、臺灣軍司令夫人、總務長官等政界層峰人物。⁴⁸

無獨有偶地，愛婦的設立也與戰爭有關。該會之成立以「一為使出征軍人無後顧之憂，能為國家之干城；二為養成一般國民尚武之精神，據以作為護國之基礎。」⁴⁹ 為宗旨，以「救護戰死者與準戰死者之遺族及廢兵」為目的。在臺灣，因為特殊的政治環境，愛婦臺灣支部也從事理蕃事業殉職軍人的遺族照顧、蕃產品交換之經營、臺灣人婦女解纏足之獎勵、女子職業講習與幼稚園之推動等事業。

愛婦臺灣支部在各州設有州部，州部設置州部長一名、州部副長二名、幹事及事務員各若干名，廳及郡市則置幹事部。⁵⁰

1910 年，愛婦韓國委員部改制「朝鮮本部」，臺灣支部遂開始屢次向東京本部陳情，希望能夠變更組織為「臺灣本部」但未果。直到 1931 年，滿洲事變爆發，日本退出國際聯盟，再加上各種婦人團體紛陳，愛婦東京本部改變方針，努力多時的臺灣支部，終於在 1932 年升格為臺灣本部。⁵¹ 本部之下，於各州設置支部，支部下轄分會，分會下有分區，

46 諸如：經營北投溫泉浴場，以及位於大分縣別府龜川的溫泉「長生園」；營救嘉義大地震受災戶、救濟臺南北門貧民、資助盲啞學生留學東京的學費等等。臺灣婦人慈善會，《台灣婦人慈善會誌》，頁 24-33。

47 〈創立卅周年を迎へた 臺灣婦人慈善會 記念に同會卅年史編纂 母子ホームを創始〉，《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34 年 10 月 27 日），第 2 版。

48 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貳拾五周年》，頁 6-10。

49 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貳拾五周年》，頁 109-110。

50 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貳拾五周年》，頁 124-129。

51 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貳拾五周年》，頁 407-408。

分區之下有班、組，深入基層。⁵²

至於愛婦臺灣支部在高雄地區的活動情形，1912年，愛婦臺灣支部致贈南部討蕃慰問袋；⁵³ 1913年，愛婦臺灣支部為募集討蕃募金，在本願寺舉辦電影放映活動，⁵⁴ 隔年，征德日軍與南蕃搜索隊徵募慰問善款，於打狗座舉辦電影放映活動；⁵⁵ 並在打狗湊町興建住宅，低價提供為社會底層住民申請；⁵⁶ 1918年打狗平和町細民（貧民）住宅因鼠疫流行而燒毀，愛婦臺灣支部後藤和子會長前往慰問，並舉行追悼會⁵⁷ 等等。

二、地方型婦人團體：高雄婦人會

隨著日治初期以來臺灣婦人團體的組成與活動，到了1910年代前後，女性漸漸意識到社交之必要，牽動地方上婦人組織的出現，例如：1909年，高雄婦女團體舉辦婦人慈善音樂會，該會長為渡部夫人，幹事為古賀、今井、塚澤、本田等4人。⁵⁸ 1911年，為募捐興建免囚保護所之經費，打狗婦人慈善會在打狗座舉辦婦人清樂，以及臺、日人演劇活動；⁵⁹ 1917年，打狗婦人會在打狗公學校舉行開會式，該會會長為三上女士，⁶⁰ 等等。但是由於缺乏更進一步的史料，以致於這些團體的面貌都很模糊，難以發掘其何時成立、會員組成等相關資料，只能從簡短的報導中略為窺知地方婦人團體之一二。較值得注意的是，1918年8月「打狗本島人婦人會」創立，短短不到兩年，會員已有150餘人，⁶¹ 顯然臺灣人女性也在這樣的潮流之中，成立了以臺灣人為主的婦女團體。然而後續未見

52 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貳拾五周年》，頁413。

53 〈打狗通信 贈品慰問〉，《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2年2月28日），第5版。

54 〈打狗愛國婦人〉，《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3年2月28日），第7版。

55 〈打狗義捐〉，《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4年11月5日），第3版。

56 〈打狗だより 安い借家〉，《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4年12月23日），第3版。

57 〈打狗追悼會〉，《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8年5月1日），第5版。

58 〈慈善音樂〉，《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09年7月3日），第5版。

59 〈打狗通信 慈善音樂〉，《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1年3月13日），第3版。

60 〈地方近事 / 打狗 婦人會發會式〉，《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7年10月8日），第1版。

61 〈打狗婦人例會 宜蘭觀光團を迎へて〉，《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0年7月5日），第2版。



打狗本島婦人會的活動情形，同樣未可知其發展。⁶²

1920 年，臺灣實施州廳制及市街庄制，置高雄州，首任州知事為富島元治。⁶³ 在臺灣行政歷練時間長，歷任南投廳長、臺北廳長的富島元治，其夫人富島巴子應也在此之前，以廳長夫人的身分擔任臺灣婦人慈善會、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等組織的幹部，參與其運作。1908 年由總督府鐵道部退職，轉任臺灣製糖株式會社、臺灣倉庫會社取締役（總經理）及高雄支店長等要職的中村一造，其夫人かつ子描述富島巴子是個講求效率（時間勵行）的人，其在高雄期間，每月固定召集婦女集會，⁶⁴ 顯見富島知事夫人是高雄地區婦人團體的靈魂人物。

1920 年 1 月，富島巴子發起成立「高雄婦人會」以作為「婦德修養之機關」。該會本部設於高雄市，州下各郡則設置支部，知事夫人為會長，各郡郡守夫人則為支部長，會員人數至多時高達二千數百餘人，是地方上有力的婦人團體。⁶⁵ 高雄婦人會成立之後，活動頗為活躍，曾舉辦音樂會，⁶⁶ 年節期間亦如同其他婦女社交團體一般，舉辦「婦人交禮會」彼此問候，會上亦有餘興節目表演。⁶⁷

為了辦理各項婦人活動所需，隔年該會欲建設一活動用之集會所。雖然當時有人認為建築會館為「不急之事業」而出言反對，但在富島會長的堅持之下，籌設會館的計畫依然被推動了。⁶⁸

建築所需經費約為二萬圓，其中一萬四千餘圓由該會負責，不足之六千餘圓則由高雄在地的企業家杉本音吉，及富商古賀三千人、中村一造、大坪與一等人，以及荒木萬

62 本文審查委員建議筆者能進一步提及其名和投入內容。在撰寫的過程中，為了勾勒高雄一帶臺人婦女的活動情形，筆者竭力搜尋相關史料。惟地方史料有限，在個人能力所及而能取得的資料中，未能進一步釐清各臺人婦女團體之面貌，在本文如期增修完成以避免影響出刊的前提下，暫未能就此部分有大規模的強化。未來若見相關史料，再擇適當之處發表。

63 富島元治，1874 年 2 月生於京都，1899 年畢業於東京帝國大學法科大學，同年通過司法官試補而任官，先後擔任安濃津、大垣區裁判所、京都、橫濱、東京、宇都宮等地地方裁判所判事、法院判官等職。1908 年渡臺任臺灣總督府法院判官，歷任臺北地方法院判官、覆審法院等職。1916 年任南投廳長，不久後被拔擢擔任臺北廳長。1918 年接續湯地幸平任臺灣總督府警察本署長（1919 年因官制改正而改制為警務局長）。宇宙亭鰻瓢，〈警察本署から警務局への十年間〉，《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08（出版年不詳），頁 274。雉本朗造，〈本島法曹略傳〉，《法院月報》，4（3）（1910），頁 46。

64 作者不詳，〈婦人の目に映した新興高雄を語る〉，《臺灣婦人界》，10 月號（1936），頁 27-28。

65 芝忠一，〈新興の高雄〉（高雄：新興の高雄發行所，1930），頁 32。

66 〈地方近事〉，《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2 年 11 月 17 日），第 4 版。

67 〈地方近事〉，《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2 年 1 月 10 日），第 3 版。

68 中山馨、片山清夫，〈躍進高雄の全貌〉（高雄：片山清夫，1940），頁 23。

三郎、大江森藏、藤林夫人、西岡郡守、吉井商行等共同支應。⁶⁹ 1936 年的某次婦人訪談中，中村一造夫人かつ子提及當年往事。她提到，婦人會館的建築經費、落成典禮的費用，都是在會長富島巴子的積極奔走之下才得以募資成功。⁷⁰

1922 年 6 月，耗資萬餘圓打造而成的高雄婦人會館竣工，⁷¹ 該建築為二層樓紅磚建築，面積達 80 坪，作為推動各種慈善事業與社會事業。⁷² 經該會討論，會館一樓充作免費診療所，二樓則作為召開各種會議或活動的空間使用。⁷³ 實際上，會館啟用以後，高雄婦人會於每月 1 日、15 日定期於婦人會館舉行集會，⁷⁴ 該會所辦理的講座也不少。

然而，1923 年 8 月，基於「種種原因」（各種の趣旨），會長得到幹部的諒解，議決解散高雄婦人會，並將其包含婦人會館在內的所屬財產全數捐贈給愛國婦人會。⁷⁵ 當天的情況是：

高雄婦人會。廿八日午後六時。于高雄劇場舉行解散會。來賓及會員冒雨來集。其數約五百名。定刻既到。涉谷夫人起述開會辭。次富島會長起言婦人會設立動機及經過。竝謂婦人會經二年八個月。于茲告終。今雖命短。然其間得官民同情。及婦人會幹部相助。遂得成優美婦人會館。恰如愛國婦人會之養女。予衷心不勝感謝。而諸位功績。亦當永久不忘。次江田氏起報告會計。來賓高橋街長亦起言婦人之力。實為偉大。現由婦人之手。成立婦人會館。為高雄街第一營造物。街民此後得永久享受各種利便。深足感謝。今婦人會雖解散。而其既往努力於社會事業。盡瘁拮据轉令人感佩不措也。式畢。有各種餘興。逾時乃散。⁷⁶

修正後之〈愛國婦人會館管理規程〉亦公告於《高雄州報》第 412 號上，說明高雄

69 芝忠一，《新興の高雄》，頁 32-33。

70 作者不詳，〈婦人の目に映した新興高雄を語る〉，頁 27-28。

71 〈高雄婦人會館 二十日落成式〉，《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2 年 6 月 15 日），第 7 版。

72 〈高雄婦人會館 落成式 二十日舉行さる〉，《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2 年 6 月 25 日），第 7 版。

73 〈高雄婦人會館 落成式 二十日舉行さる〉，第 7 版。

74 〈高雄婦人會事業〉，《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2 年 9 月 10 日），第 9 版。

75 〈富島知事夫人を會長とする 高雄婦人會は解散 婦人會館は愛國婦人會へ〉，《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3 年 8 月 24 日），第 7 版。

76 〈高雄婦人會解散〉，《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3 年 8 月 31 日），第 6 版。



婦人會館於 1923 年 12 月起改名為愛國婦人會館。⁷⁷

高雄婦人會僅存在兩年餘就告終，究竟報載的「種種原因」究竟是什麼呢？

肆、婦人社交場域的統合

臺灣慈善婦人會、篤志看護婦人會及愛婦臺灣支部為日治時期臺灣最主要的婦人團體，而這三個團體中，篤志看護婦人會無設有高雄支部，因此其在高雄的活動相對來說較不活躍。臺灣婦人慈善會因由後藤民政長官夫人和子所倡設，網羅了臺灣時下官民貴婦人，因此一度為臺灣最活躍之婦人團體，1910 年代以來，高雄地區的許多社會慈善事業亦由臺灣婦人慈善會所推動，和高雄的關係較為密切。然而後藤離開臺灣之後，該會的活動情形大不如前，原本每年春、秋季固定舉辦的音樂會等慈善活動也漸漸弛於舉行，其活動之不彰「幾乎讓人忘了它的存在，著實令人遺憾」，⁷⁸ 1908 年大島久滿次出任總督府民政長官時，其夫人力圖振作臺灣婦人慈善會，再創新局。

至於愛婦臺灣支部，該部於 1904 年成立時，由於縱貫鐵路尚未通車，高雄港亦未築成，鳳山廳、蕃薯寮廳、阿猴廳、恆春廳相對來說發展較為緩遲，愛婦臺灣支部在本地未設有幹事部，直到支部長後藤和子督促之下，四廳之幹事部才先後設置。⁷⁹

1909 年十二廳制實施以後，蕃薯寮廳及恆春廳遭到撤廢，原來的鳳山廳劃入臺南廳管轄，僅存阿猴廳，阿猴遂以臺灣南部的中心都市之姿，逐漸發展起來，從愛婦臺灣支部在該地的會員人數來看，阿猴廳的會員人數也是原四廳中最多的。⁸⁰ 另一方面，該會內部的發展也隨著總督府施政重心的轉移而調整。1915 年，隨著總督佐久間左馬太主導的五年理蕃計畫告一段落，成立以來即積極支援理蕃慰問的愛婦臺灣支部也須調整會務方向，以確保長久且穩定的財源。此外，愛婦臺灣支部本身也面臨了會員滯納會費的情形，

77 〈彙報〉，《高雄州報》第 412 號（高雄：高雄州，1923），頁 266。

78 〈婦人團體に望む〉，《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08 年 7 月 28 日），第 2 版。

79 大橋捨三郎，《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沿革誌》，頁 695-696。

80 根據 1907 年愛婦臺灣支部的會員人數統計（以下人數均為「特別會員」與「通常會員」合計之總人數），鳳山廳為 656 人，蕃薯寮廳為 233 人，阿猴廳為 1,624 人，恆春廳為 43 人。大橋捨三郎，《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沿革誌》，頁 697。

未繳納會費的會員比例高達三到四成。⁸¹這種種的因素，造成會務方針的大規模調整，1916年，該會議決廢止六大事業（救護、養蠶、授產場、雜誌、蕃產品交換、活動寫真）中「雜誌」、「蕃產品交換」及「活動寫真」三項，並淘汰冗員、節約冗費，同時，透過重新整理會員名冊、積極招募新會員入會，以及徵收滯納會費，來穩固該會的發展基礎。⁸²

1920年高雄置州之後，此時縱貫鐵路早已通車，高雄港碼頭亦已建成為南部吞吐要港，高雄一躍成為五州之中最亮眼的活力城市，產業發展之熱絡，不可與當年同日而語，再加上知事夫人富島巴子本身的熱心奔走，成立了高雄婦人會，且其活躍有目共睹。然而愛國婦人會也在此時於高雄設置「州部」，州下各郡設置「幹事部」，同樣由富島知事夫人任州部長，各郡守夫人擔任幹事部長。

至此，我們很快地注意到，1920年之後，高雄地區幾乎同時出現了兩個功能類似且重合性極高的婦女團體：「愛國婦人會高雄州支部」及「高雄婦人會」，而且兩會的幹部名單完全重疊了。

更有趣的是，作為地方婦女團體的高雄婦人會會務蓬勃運作，而全臺灣甚至是全國婦女組織地方支部的愛婦高雄州支部，會務卻萎靡不振，難見起色。時人以為「在幅員狹小的高雄天地裡，兩個婦人團體的對立在諸般面向上都產生阻礙，終究是無法兩立的。而作為愛國婦人會地方首腦人物的知事夫人，不可獨獨將心力傾注至高雄婦人會之中，而將愛國婦人會等閒視之。」⁸³

1923年1月，原任職於臺中州的內海庄五郎調任高雄州內務部勸業課，⁸⁴兼任愛國婦人會州部委員，內海注意到愛國婦人會高雄州支部與高雄婦人會之間的關係，力陳州下婦人團體統合之必要性。在他的勸說之下，富島會長察知了輿論的趨勢，便親自前往臺北，會晤愛婦臺灣支部長。未久，富島會長便召集幹部，決議解散，並將所屬財產捐贈予愛婦臺灣支部。惟高雄婦人會館雖捐贈予愛婦臺灣支部，並改名為愛國婦人會館，但愛婦臺灣支部仍將婦人會館的營運委由該會高雄州部負責。⁸⁵自此，高雄地區僅存愛婦臺灣支部高雄州部，1924年，愛國婦人會高雄州支部頒授有功章予對於該會有功之人士，

81 〈家庭欄 家庭の紀念には 各種團體の會費未納〉，《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15年12月9日），第4版。

82 大橋捨三郎，《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沿革誌》，頁192-212。

83 芝忠一，《新興の高雄》，頁33。

84 高雄州，《高雄州報》第293號（高雄：高雄州，1923），頁11。

85 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貳拾五周年》，頁33。



一等有功章及附加章頒贈予知事富島元治夫婦，以及高雄郡守岩本多助夫婦。⁸⁶

伍、結論

在以往的政治史或區域史研究中，學者多集中將焦點置於男性領導階層的變化，至於這些領導階層的女性家族成員，相關研究則寥寥無幾。在本文中，筆者先將領導階層分為「全臺型」領導階層與「地方型」領導階層，由於他們的互動往來所需，連帶牽引著其女性家眷亦產生互動的社交需求。另一方面，隨著三大全臺型婦人團體：「臺灣婦人慈善會」、「篤志看護婦人會」及「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在臺灣組織、活動，以及高雄婦人會等地方婦人團體的成立與運作，一步步創出地方上婦女的社交場域。而主事者積極與否，也是牽繫團體發展是否活躍的關鍵因素，例如高雄婦人會在會長富島巴子的熱心引領之下，竟能募得建築高雄婦人會館的大筆經費，並積極推動地方上的婦人事業，相較於其他地方，高雄地區婦人團體短期內迅速發展的熱烈程度，著實令人驚訝。

然而，它們也面臨到成員高度重疊的問題。無論是全臺型婦人團體，或是地方型婦人團體，它們皆是以地方行政首長夫人為領導者，次級行政官僚的夫人為核心幹部，地方領導人物之女眷則為協力角色，這樣的組織模式，在高雄州成立之後，就遇到統合的問題，尤其是知事夫人富島巴子一手創成的高雄婦人會，活躍程度竟高於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高雄州部，因此，在地方人士的勸說之下，1923 年高雄婦人會自請解散，並將所屬財產全數贈予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高雄州部，再接受其委託，管理、經營高雄婦人會館等相關事業，可以說，建築物仍是同一座，經營者也如昔管理這裡，但從「高雄婦人會館」到「高雄愛國婦人會館」的易名，其實正見證了地方上婦人社交空間由創出、發展到統合的歷程。至於組織內部是否有競爭關係，或是臺、日人女性在團體內所扮演的角色，則是留待未來繼續探究的課題。

86 〈地方近事〉，《臺灣日日新報》日刊（1924 年 4 月 30 日），第 4 版。

參考書目／

一、戰前

（一）圖書、單行本

- 大橋捨三郎（1941），《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沿革誌》。臺北：愛國婦人會臺灣本部。
- 中山馨、片山清夫（1940），《躍進高雄的全貌》。高雄：片山清夫。
- 作者不詳（出版年不詳），《臺灣形勢概要》第2冊。出版項不詳。
- 芝忠一（1930），《新興的高雄》。高雄：新興的高雄發行所。
- 高雄州（1923），《高雄州報》第293號。高雄：高雄州。
- 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1929），《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貳拾五周年》。臺北：愛國婦人會臺灣支部。
- 臺灣婦人慈善會（出版年不詳），《臺灣婦人慈善會誌》。出版項不詳。
- 鷹取田一郎（1916），《臺灣列紳傳》。臺北：臺灣總督府。

（二）期刊、報紙文章

- 〈女教勃興〉（1906年5月27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2版。
- 〈中壢近信〉（1924年1月4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2版。
- 〈打狗だより 安い借家〉（1914年12月23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3版。
- 〈打狗追悼會〉（1918年5月1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5版。
- 〈打狗婦人例會 宜蘭觀光團を迎へて〉（1920年7月5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2版。
- 〈打狗細民家屋落成期〉（1907年3月9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2版。
- 〈打狗通信 慈善音樂〉（1911年3月13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3版。
- 〈打狗通信 贈品慰問〉（1912年2月28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5版。
- 〈打狗港民家燒拂〉（1907年6月27日），《漢文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2版。
- 〈打狗愛國婦人〉（1913年2月28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7版。
- 〈打狗義捐〉（1914年11月5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3版。
- 〈地方近事 / 打狗 婦人會發會式〉（1917年10月8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1版。
- 〈地方近事〉（1922年1月10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3版。
- 〈地方近事〉（1922年11月17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4版。
- 〈地方近事〉（1924年4月30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4版。
- 〈赤十字社小史〉（1908年10月29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2版。
- 〈夜會待賓〉（1909年6月17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4版。
- 〈家庭欄 家庭の紀念には 各種團體の會費未納〉（1915年12月9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4版。
- 〈桃園婦人交禮會〉（1917年1月9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6版。
- 〈桃園婦人會の名刺交換會〉（1931年1月17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7版。
- 〈高雄婦人會事業〉（1922年9月10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9版。
- 〈高雄婦人會解散〉（1923年8月31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6版。
- 〈高雄婦人會館 二十日落成式〉（1922年6月15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7版。
- 〈高雄婦人會館 落成式 二十日舉行さる〉（1922年6月25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7版。
- 〈基隆特訊〉（1924年1月13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6版。
- 〈婦人團體に望む〉（1908年7月28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2版。
- 〈將來之打狗港〉（1906年10月7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4版。
- 〈創立卅周年を迎へた 臺灣婦人慈善會 記念に同會卅年史編纂 母子ホームを創始〉（1934年10月27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2版。
- 〈富島知事夫人を會長とする 高雄婦人會は解散 婦人會館は愛國婦人會へ〉（1923年8月24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7版。

〈彙報〉(1923 年 12 月 15 日)·《高雄州報》第 412 號(高雄:高雄州)·頁 266。

〈慈善音樂〉(1909 年 7 月 3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5 版。

〈臺中地方近事〉(1917 年 1 月 10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3 版。

〈鳳山短信〉(1906 年 12 月 6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2 版。

〈雜報〉(1907 年 1 月 12 日)·《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2 版。

「臺灣市制」(1920 年 7 月 30 日)·〈大正 9 年 7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2170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頁 56。

「臺灣街庄社二區長及區書記ヲ置クノ件」(1909 年 9 月 24 日)·〈明治 42 年 9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2798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頁 45。

「臺灣總督府地方官官制改正」(1901 年 11 月 19 日)·〈明治 34 年 11 月臺灣總督府報第 1059 期〉·《臺灣總督府(官)報》·頁 50-51。

宇田亨鯉鰭(出版年不詳)·〈警察本署から警務局への十年間〉·《臺灣警察協會雜誌》·108·頁 274。

作者不詳(1936)·〈婦人の目に映した新興高雄を語る〉·《臺灣婦人界》·10 月號·頁 27-28。

作者不詳(1900)·〈雜報〉·《臺灣醫事雜誌》·2(2)·頁 44-45。

金子源治(1900)·〈天然足會に就て〉·《臺灣協會會報》·20·頁 25-26。

南樵(1908 年 1 月 1 日)·〈臺灣婦女生活界〉·《臺灣日日新報》日刊·第 9 版。

雫本朗造(1910)·〈本島法曹略傳〉·《法院月報》·4(3)·頁 46。

二、戰後

(一) 專書

文崇一(1989)·《臺灣的社區權力結構》。臺北:東大圖書。

王御風(2013)·《高雄社會領導階層的變遷(1920-1960)》。臺北:玉山社。

洪郁如著·吳佩珍、吳亦昕譯(2017)·《近代台灣女性史:日治時期新女性的誕生》。臺北:臺大出版中心。

楊翠(1993)·《日據時期台灣婦女解放運動——以〈台灣民報〉為分析場域》。臺北:時報文化。

(二) 期刊、合輯文章

吉川龍子(2013)·〈明治期の赤十字看護教育〉·《明治聖徳記念学会紀要》復刊第 50 號·頁 387-403。

洪郁如(1997)·〈日本殖民統治與婦人團體——試論 1904-1930 年的愛國婦人會台灣支部〉·《臺灣風物》·47(2)·頁 53-71。

若林正丈(2001)·〈内地延長主義と「臺灣議會」〉·收於若林正丈·《臺灣抗日運動史研究 增補版》·頁 54-74。東京:研文出版。

陳其南(1998)·〈臺灣的本土意識與民族國家主義之歷史研究〉·收於陳其南·《傳統制度與社會意識的結構——歷史與人類學的探索》·頁 169-203。臺北:允晨文化。

(三) 網站資料

高雄市政府文化局·〈「原愛國婦人會館(紅十字育幼中心)」古蹟歷史沿革介紹〉。資料檢索日期:2018 年 9 月 16 日。

網址:<http://heritage.khcc.gov.tw/Heritage.aspx?KeyID=49001c0e-2ea3-4162-b8ca-0edcc855c70e>。

附表1／

二十廳制時期（1901-1909）高雄地區行政首長列表

廳	廳長	支廳	支廳長
鳳山廳	川田久喜（1901-1905） 橫山虎次（1905-1909）	打狗支廳	吉瀨熊次郎（1901-1905） 池田直太郎（1905-1907） 安倍利三郎（1907-1909）
		楠梓坑支廳	美田喜次郎（1901-1902） 小島宗三郎（1902-1905） 木村丁吉（1905-1905） 伊關喜一（1905-1907） 池田直太郎（1907-1909）
		阿公店支廳	吉田勝登（1901-1903） 般若三郎（1903-1905） 園部龍因（1905-1908） 相馬倫（1908-1909） 江藤熊男（1909）
蕃薯藔廳	石橋亨（1901-1909）	山杉林支廳 ⁸⁷	成澤孝作（1901-1902） 池田鳴遠（1902-1904） 園部龍因（1904-1905） 松永熊次郎（1905-1909）
阿緱廳	桑原外助（1901-1902） 佐佐木基（1902-1909）	阿里港支廳	大川五郎（1901-1903） 上井其介（1903-1903） 中島友五郎（1903-1905） 原口健太郎（1905-1907） 治家利雄（1907-1908） 中川清（1908-1909）
		內埔支廳 ⁸⁸	山內定一（1901-1903） 入佐宗計佐（1903-1905）
		萬丹支廳 ⁸⁹	上井其介（1901-1903）
		東港支廳	本田柳藏（1901-1904） 小笠原長展（1904-1904） 金子惠教（1904-1909） 飛田孫兵衛（1909）
		潮州庄支廳	般若三郎（1901-1903） 中島義真（1903-1903） 山內定一（1903-1905） 中島友五郎（1905-1905） 入佐宗計佐（1905-1906） 大澤嘉十郎（1906-1909）

87 山杉林支廳於1906年改名阿里關支廳，隸屬臺南廳。

88 內埔支廳於1905年廢止。

89 萬丹支廳於1903年廢止。



(續上表)

廳	廳長	支廳	支廳長
阿緱廳		枋寮支廳	大場俊三 (1901-1903) 中島友五郎 (1903-1903) 本橋弘人 (1903-1904) 大澤嘉十郎 (1904-1906) 金子惠教 [兼] (1906-1906) 飛田貞熊 (1906-1908) 高江仲太郎 (1908-1909)
恆春廳	森尾茂助 (1901-1904) 柳本通義 (1904-1907) 松崎省吾 (1907-1907) 武藤針五郎 (1907-1909)	枋山支廳	中條信可 (1901-1903) 風間兼次郎 (1903-1905) 清水源次郎 (1905-1906) 正本義光 (1906-1907) 內田守夫 (1907-1909) 早川半之資 (1909)
		蚊蟀支廳	吉田俊人 (1901-1903) ⁹⁰ 岩田敬喜 (1904-1904) 松村儀十郎 (1904-1907) 早川半之資 (1907-1909) 生駒悅太郎 (1909)

資料來源：筆者據1901年至1909年各年度各廳《廳報》及《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整理而成。

說明：括號內為任期。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SIUNG MUSEUM OF HISTORY

90 1903 年《臺灣總督府職員錄》中，蚊蟀支廳長記載為「缺員」。

附表2／

十二廳制時期（1909-1920）高雄地區行政首長列表

廳	廳長	支廳	支廳長
臺南廳	松木茂俊（1909-1915） 枝德二（1915-1920）	鳳山支廳	河東田義一郎（1909-1911） 鹽尻彌太郎（1911-1913） 牟田真雄（1913-1915） 池田直太郎（1915-1916） 近藤滿夫（1916-1917） 安倍利三郎（1917-1920）
		打狗支廳	高橋傳吉（1909-1914） 田中庸茂（1914-1915） 本田正巳（1915-1917） 三上喜千藏（1917-1919） 岩本多助（1919-1920）
		阿公店支廳	江藤熊男（1909-1913） 金友順誓（1913-1915） 菊地角太郎（1915-1916） 安達安太郎（1916-1920）
		楠梓坑支廳	世木素平（1909-1911） 秋光一郎（1911-1914） 齋藤治三郎（1914-1917） 栗原萬三郎（1917-1920）
阿緱廳	佐藤謙太郎（1909-1914） 立川連（1914-1917） 齋藤愛二（1917-1919） 高山仰（1919-1920）	阿里港支廳	慶邦武（1909-1911） 武藤猛（1911-1913） 脇田義一（1913-1914） 毛利平十郎〔兼〕（1914-1915） 齋藤永治（1915-1916） 貴島勇熊（1916-1918） 岩下實業（1918-1920） 杉森隆次（1920）
		甲仙埔支廳	松永熊次郎（1909-1911） 田所實（1911-1913） 毛利平十郎（1913-1916） 貴島勇熊（1916-1916） 中村公規（1916-1920） 小林嘉一郎（1920）
		六龜里支廳	岡本哲人（1909-1916） 井阪仁太郎（1916-1920） 岩下實業（1920）
		蕃薯寮支廳	井野邊幸如（1909-1910） 大澤嘉十郎（1910-1910） 成澤孝作（1910-1916） 齋藤永治（1916-1920）
		潮州支廳	大澤嘉十郎（1909-1910） 湊矢之助（1910-1911） 松永熊次郎（1911-1913） 田所實（1913-1917） 池上憲政（1917-1920）

(續上表)

廳	廳長	支廳	支廳長
阿緱廳		東港支廳	河瀨米藏 (1909-1913) 伴斗兵 (1913-1917) 下川靜一 (1917-1920) 貴島勇熊 (1920)
		枋寮支廳	兼子鐵吉 (1909-1910) 生駒悅太郎 (1910-1915) 荒屋權右兵衛 (1915-1916) 小林嘉一郎 (1916-1920) 中村公規 (1920)
		枋山支廳	早川半之資 (1909-1913) 加藤幸右衛門 (1913-1915) 長崎重次郎 (1915-1917) 柏尾久吉 (1917-1920) 屋嘉比柴清 (1920)
		恆春支廳	小山謙 (1909-1913) 河瀨米藏 (1913-1913) 齋藤永治 (1913-1915) 小山謙 (1915-1916) 鹽尻彌太郎 (1916-1916) 中島彥四郎 (1916-1918) 川畑芳太郎 (1918-1918) 貴島勇熊 (1918-1920) 柏尾久吉 (1920)
		蚊蟀支廳 ⁹¹	生駒悅太郎 (1909-1911) 小山謙 [兼] (1911-1913) 佐藤友次 (1913-1913)
澎湖廳	橫山虎次 (1909-1914) 澤井瀨平 (1914-1917) 相川茂鄉 (1917-1919) 川中子安治郎 (1919-1920)	小池角支廳 ⁹²	齋藤透 (1909-1910) 檜山幸三郎 (1910-1915)
		大赤崁支廳 ⁹³	檜山幸三郎 (1909-1910) 衣山正 (1910-1913)
		網垵支廳	衣山正 (1909-1910) 齋藤義輝 (1910-1912) 松本太郎 (1912-1913) 衣山正 (1913-1913) 氏家壽右衛門 (1913-1915) 大堀久吾 (1915-1916) 別府兵太郎 (1916-1920)

資料來源：筆者據1909年至1920年各年度各廳《廳報》及《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整理而成。

說明：括號內為任期。

91 蚊蟀支廳於 1913 年併入恆春支廳。

92 小池角支廳於 1915 年廢止。

93 大赤崁支廳於 1913 年廢止。

附表3／

州制初期（1920-1923）高雄州知事及（郡）街庄長列表

知事	郡	郡守	街庄	街庄長
富島元治	高雄郡	川中子安治郎（1920-1921） 西岡健之（1921-1923） 岩本多助（1923）	高雄街	鐸木直之助（1920-1922） 加福均三（1922-1923） 高橋傳吉（1923）
			仁武庄	林如東
			燕巢庄	陳坤
			楠梓庄	林土城
			左營庄	鄭新芬（1920-1922） 鄭總楷（1922-1923）
	岡山郡	高島怡三郎（1920-1923） 城戶彥市（1923）	岡山庄	黃旺先（1920-1921） 齋藤善次郎（1921-1923）
			阿蓮庄	楊邦（1910-1923） （1923）
			路竹庄	王抱（1920-1923） 洪宗沛（1923）
			湖內庄	蘇文治
			彌陀庄	歐偉雲
	鳳山郡	安倍利三郎（1920-1923） 小倉信一（1923）	鳳山街	青木惠範（1920-1923） 齋藤永治（1923）
			小港庄	黃宇宙（1920-1923） 大槻林藏（1923）
			林園庄	劉萬在
			大寮庄	張簡忠
			大樹庄	鄭坤五
			鳥松庄	趙從貞
	旗山郡	松村儀十郎	旗山街	陳順和
			美濃庄	邱義生
			杉林庄	呂保生
			甲仙庄	翁朝
			內門庄	陳清己
			田寮庄	柯常



(續上表)

知事	郡	郡守	街庄	街庄長
富島元治	屏東郡	永田綱明	屏東街	今村伊那吉
			長興庄	邱玉梅
			鹽埔庄	葉瑞清 ⁹⁴
			高樹庄	溫暮春
			六龜庄	洪見濤
			里港庄	藍高全
			九塊庄	龔天降
			潮州庄	林廉
	潮州郡	池田鳴遠	萬巒庄	林添壽
			內埔庄	鐘幹郎
			竹田庄	李才祉
			新埤庄	鍾阿榮 (1920-1922) 鍾啟麟 (1922-1923) ⁹⁵
			枋寮庄	李水來
			枋山庄	王啟智
	東港郡	新館謹次郎	東港街	黃景謨
			新園庄	陳林石
			萬丹庄	李南
			林邊庄	黃添福
			佳冬庄	蕭恩鄉
			琉球庄	林玉書
	恆春郡	齋藤永治 (1920-1923) 城戶彥市 (1923)	恆春庄	陳雲士
			車城庄	許連升
			滿州庄	潘阿別
	澎湖郡	竹下康之	馬公街	上瀧宇太郎
			湖西庄	洪明庭 (1920-1923) 陳梅峯 (1923)
			白沙庄	陳長桂
			西嶼庄	楊棋
			望安	陳茂松

資料來源：筆者據1920年至1923年各年度《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整理而成。

說明：括號內為任期，未標示則為1920年至1923年皆任該職。

94 葉瑞清，有些年度《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寫作「葉瑞菁」，應指同一人，此處記為「葉瑞清」。

95 鍾啟麟，有些年度《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寫作「張啟麟」，應指同一人，此處記為「鍾啟麟」。

附表4／

十二廳制時期（1909-1920）高雄地區參事及區長列表⁹⁶

廳	參事		
臺南廳	商朝鳳（1910-1912）	蘇有志（1910-1916）	江以忠（1910-1916）
	林霽川（1910-1917）	吳尚仁（1910-1913）	盧德祥（1910-1918）
	盧潤堂（1910-1916）	陳人英（1910-1920）	陳鴻鳴（1912-1920）
	楊鵬搏（1913-1920）	陳啟貞（1916-1920）	許廷光（1917-1920）
	江潤（1917-1920）	林靜觀（1919-1920）	謝群我（1919-1920）
阿緱廳	蘇雲英	藍高川	李廷光（1910-1913）
	黃添福	周純臣	黃耀光（1910-1918） ⁹⁷
	江德明	蔡祐成	王福（1912-1915、1917-1919）
	鍾晉郎二（1913-1920）	王麟（1915-1917）	
澎湖廳	陳梅峯	蔡清溪（1915-1920）	楊棋（1915-1920）
	蔡汝璧（1910-1911）	鄭馨秋（1910-1914）	

以下臺南廳區長

區	區長	區	區長
阿公店	王福信（1910-1911） 黃旺光（1911-1920）	梓官	歐偉雲
彌陀港	高允 ⁹⁸	五甲	郭受福（1910-1919） 鍾乾巽（1919-1920）
阿塹	林富	一甲	王棟（1910-1915） 王振（1915-1917） 王開泰[書]（1917-1918） 王道宗（1918-1920） 王抱[書]（1920）
大湖	林彩澤（1910-1918） 林清泉（1918-1920）	圍仔內	葉宜和（1910-1919） 蘇文治（1919-1920）
竹仔港	張作舟	楠梓坑	林土城

96 1909年《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為記載各廳參事名單，因此此處參事任期均錄為1910年起

97 黃耀光，各年度《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寫作「黃耀光」，後期漸漸固定為「黃耀光」。寫法各有不同，但應指同一人，此處記為「黃耀光」。

98 高允，僅1910年度《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寫作「高元」，應指同一人，此處記為「高允」。



(續上表)

區	區長	區	區長
考潭	劉是 (1910-1916) 周泗濱 [書] (1916-1918) 陳涼 (1918-1919) 鄭再添 (1919-1920)	保舍甲	陳榮 (1910-1911) 陳清華 (1911-1920)
援巢中	林雲如 (1910-1916) 陳坤 (1916-1920)	仕隆	林維城 (1910-1913) 陳賢 (1913-1920)
後勁	楊雲階 (1910-1919) 何金麟 [書] (1919-1920) 陳隆民 (1920)	打狗	葉宗祺
苓雅寮	陳文遠 (1910-1919) 陳晉臣 (1919-1920)	左營	黃道瑞 (1910-1911) 鄭新芬 (1911-1920)
埤仔頭	吳汝溥 (1910-1917) ⁹⁹ 曾廷垣 (1917-1920)	鳳山	林靜觀 (1910-1919) 李汝福 (1919-1920)
七老爺	蔡英三 (1910-1911) 鄭頭 (1911-1920) 林贊 (1920)	大林蒲	邱斐然 (1910-1912) 吳汀 (1912-1920)
空地仔	李清廉 [兼] (1910-1911) 簡燦 (1911-1920)	赤崁	張簡忠
林仔邊	黃玉邦 (1910-1917) 劉萬在 (1917-1920)	翁公園	簡汝淮
小坪頂 ¹⁰⁰	陳開怡	姑婆寮	吳烏健
赤山	鄭元 (1910-1913) 黃保生 (1913-1920) 趙從貞 (1920)	中芸 ¹⁰¹	林文宙 (1911-1913) 黃法 (1913-1917) 黃玉邦 (1917-1920)
港仔墘 ¹⁰²	李清廉 (1911-1915) 李清結 [書] (1915-1917) 李清結 (1917-1920)		

99 吳汝溥，各年度《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寫作「吳汝博」、「吳汝搏」，後期漸漸固定為「吳汝溥」。寫法各有不同，但應指同一人，此處記為「吳汝溥」。

100 「小埤頂區」於 1918 年改名「九曲堂區」。

101 1911 年《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新錄。

102 1911 年《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新錄。

(續上表)

以下阿緱廳區長

區	區長	區	區長
阿緱	許宗朝 (1910-1914) 蘇雲英 (1914-1920)	公館	陳從賢
社皮	徐辜連周 (1910-1915) 林興儀 [書] (1915-1917) 林興儀 (1917-1920)	麟洛	邱瑞河 (1910-1920) 邱玉梅 (1920)
老埤	林明經 [書] (1910-1913) 林明經 (1913-1916) 林明德 (1916-1920) 林明經 (1920) ※ 可能為同一人	萬丹	李南
新庄仔	李君重	鹽埔	謝知高
阿里港	藍高全	九塊厝	鄭琢如 (1910-1912) 劉文詩 (1912-1920) 龔天降 [書] (1920)
土庫	龔陽 (1910-1913) 韓哲卿 (1913-1919) 龔壽字 (1920-1920) 陳蜈蚣 (1920)	東振新	賴阿郎 (1910-1913) 梁祝生 (1913-1919) 溫慕春 [書] (1919-1920)
加納埔	潘文程 [書] (1910-1913) 藍高臨 (1913-1920)	山杉林	呂保生 [書] (1910-1913) 呂保生 (1913-1920)
甲仙埔	黃旺 (1910-1912) 劉龍秋 (1912-1916) 謝安 [書] (1916-1917) 王友明 (1917-1919) 童萬成 [書] (1919-1920) 謝安 [書] (1920)	月眉	唐肇堯 (1910-1916) 林富廷 [書] (1916-1917) 黃錫勳 (1917-1919) 黃添福 (1919-1920)
溝坪	何發 (1910-1914) 郭友 (1914-1920)	荖濃	吳連生 (1910-1917) 傅鹽梅 [書] (1917-1919) 陳進發 (1919-1920)
六龜里	黃金連 [書] (1910-1912) 邱貴興 (1912-1913) 邱秀琳 (1913-1917) 邱添麟 (1917-1920)	蕃薯藔	陳順和
溪州	陳星輝 (1910-1912) ¹⁰³ 周純臣 (1912-1920)	田寮	李國定 (1910-1919) 李國廷 (1919-1920) ※ 可能為同一人
古亭坑	柯常	觀音亭	陳忠修

103 陳星輝·各年度《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寫作「陳清輝」·寫法各有不同·但應指同一人·此處記為首次出現的「陳星輝」。

(續上表)

區	區長	區	區長
龍肚	陳連生 (1910-1911) 劉炳華 (1911-1913) 鍾連福 (1913-1920) 黃添元 (1920)	瀾濃	宋守四 (1910-1919) 邱義生 (1919-1920)
旗尾	陳屋人 (1910-1919) 莊開能 (1919-1920)	內埔	鍾晉郎二 ¹⁰⁴
新東勢	邱毓珍 (1910-1912) 邱連石 ¹⁰⁵ (1912-1916) 鍾晉郎二 [兼] (1916-1919) 林保郎 [書] (1919-1920)	新北勢	陳經奎
二崙	林鞠臣 (1910-1917) 陳集榮 (1917-1920)	鳳山厝	李持 (1910-1919) 李補 (1919-1920)
潮洲	陳榮玉 (1910-1917) 林廉 (1917-1920)	崁頂	陳謙 (1910-1920) 羅喜 (1920)
萬巒	林連興 (1910-1914) 林添壽 (1914-1920)	佳佐	陳安侯 [書] (1910-1911) 陳能角 (1911-1917) 陳超 (1917-1918) 李心正 [書] (1918-1919) 李開郎 (1919-1920) 陳安侯 (1920)
東港	黃文範 (1910-1912) 黃景謨 [書] (1912-1913) 黃景謨 (1913-1920)	七塊厝	黃得
林仔邊	阮達天	茄荖腳	楊正邦 (1910-1911) 羅金祥 ¹⁰⁶ (1911-1919) 蕭思鄉 [書] (1919-1920)
新埤頭	張少雲 (1910-1911) 黃百增 (1911-1912) 張添倬 (1912-1920)	新園	陳福 (1910-1920) 陳林石 (1920)
仙公廟	吳川 (1910-1912) 黃荏來 ¹⁰⁷ (1912-1920)	琉球	林玉書 (1910-1913) 蔡鵠 (1913-1918) 林玉書 (1918-1920)
枋寮	董興	水底寮	陳吉六
楓港	王福 (1910-1919) 王啟智 (1919-1920)	枋山	陳天明 [書] (1910-1911) 楊元生 [書] (1911-1914) 董知高 (1914-1920)
恆春	陳雲士	鵝鑾鼻	蔡祐成

104 鍾晉郎二，各年度《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寫作「鍾晉郎」、「鍾晉郎」、「鍾晉郎二」。寫法各有不同，但應指同一人，此處記為後期統一的「鍾晉郎二」。

105 邱連石，各年度《臺灣總督府職員錄》寫作「邱連石」。寫法各有不同，但應指同一人，此處記為後期統一的「邱連石」。

106 羅金祥，各年度《臺灣總督府職員錄》亦寫作「羅經祥」。寫法各有不同，但應指同一人，此處記為首次出現的「羅金祥」。

107 「荏」字應為「王」下「王」。

(續上表)

區	區長	區	區長
龍泉水	尤炳文 (1910-1920) 陳雲士 [兼] (1920)	太平頂	廖寶 (1910-1912) 陳水生 (1912-1920)
虎頭山	楊和春 (1910-1912) 楊矩春 (1912-1915) ※ 可能為同一人 陳雲士 [兼] (1915-1918) 黃明智 (1918-1920)	車城	許連升
射麻裡	賴景春 (1910-1919) 余雲祥 [書] (1919-1920) 余雲祥 (1920)	蚊蟀	林阿記 (1910-1919) 尤昆平 (1919-1920)

以下澎湖廳區長

區	區長	區	區長
媽宮	鄭馨秋 (1910-1915) 陳桂卿 (1915-1920)	文澳	蔡清溪 (1910-1918) 徐文鍼 (1918-1920)
嵵裡	歐蘊玉 (1910-1915) 高乃昌 (1915-1920)	隘門	黃奢
湖西	許萬發 (1910-1913) 蔡少春 (1913-1914) 辛徹 (1914-1920)	鼎灣	陳紫薇
鎮海	陳長桂	赤崁	鄭良文
瓦碇	吳文仁 (1910-1911) 顏敏 (1911-1920)	小池角	楊攀
內垵	薛天麟	網垵	陳茂松
大嶼	林其祥 (1910-1911) 呂葵 (1911-1914) 鄭礪 (1914-1920)		

資料來源：筆者據1909年至1920年各年度《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整理而成。

說明：1.括號內為任期，若無標示，則表示1909年至1920年全任期。2.[兼]：兼任。[書]：書記代理區長。



附表5／

州廳制初期（1920-1923）高雄州協議會員列表¹⁰⁸

州	參事		
高雄州	御廚規三（1920-1921）	永田綱明	川中子安次郎（1920）
	東忠藏（1920-1922）	澁谷信吾（1920-1922）	古賀三千人（1920）
	平山寅次郎（1920-1922）	今井周三郎	小山美登四（1920）
	加福均三（1920-1922）	陳中和（1920-1922）	濱田政壯
	藍高川（1920）	蘇雲英	上瀧宇太郎
	白石喜代治	鍾晉郎二	林靜觀
	林清泉	李幾法	西岡健之（1921-1922）
	今村伊那吉（1921-1923）	坂本信道（1921-1923）	陳啟貞（1921-1923）
	草野義一（1922-1923）	飯田盛敏（1923）	藤林賢治（1923）
	勝又獎（1923）	草鹿砥祐吉（1923）	陳光燦（1923）
	鐸木直之助（1923）		

資料來源：筆者據1920年至1923年各年度《臺灣總督府職員錄》整理而成。

說明：括號內為任期，若無標示，則表示1909年至1920年全任期。

108 1909 年《臺灣總督府職員錄》為記載各廳參事名單，因此此處參事任期均錄為 1910 年起。



高雄市立歷史博物館

KAOHSIUNG MUSEUM OF HISTORY

